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谢天振 著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复旦大学出版社

谢天振 著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谢天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7155-9

I. 比… II. 谢… III. ①比较文学-文集②翻译-文集 IV. ①I0-03②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0812 号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谢天振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赖英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01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155-9/I·538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代序：我与比较文学

我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有点出于偶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师从廖鸿钧教授攻读俄苏文学硕士学位。一天在翻阅当时还属于“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动态》杂志时，一则学术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该报道说有一位美国学者李达三（John Deeney）在北京作了一场学术讲座，此人的身份是“比较文学教授”。“比较文学？什么是比较文学？”这则报道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于是遍翻当时可以找到的工具书，但当时国内已经出版的工具书里都没有关于“比较文学”的介绍。与我同宿舍的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见我对比较文学如此好奇，便对我说，他可以帮我去问问他们的外籍专家，此人是美国文学专家和文学理论家，也许知道。结果那位美国教授借了一本书给我说：这上面就有关于比较文学的内容。这本书就是后来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里面第二章的标题赫然就是“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

借得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后，我如获至宝，回来后就一遍又一遍地用心研读。接着，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及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写了一篇《比较文学漫谈》，发表在1980年的《译林》杂志上。这也是当时国内报纸杂志上继周伟明、季羡林两位先生之后倡导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篇文章。此后不久，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学校根据我的意愿，把我分配在刚刚建立不久的语言文学研究所。

新成立的上外语言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著名的乔叟研究专家、陶（渊明）诗英译专家方重教授，但主持研究所科研、教学等日常工作的是时任常务副所长的廖鸿钧教授。廖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察觉到比较文学这门当时在中国还刚刚冒尖的新兴学科의无限发展前景，所以当机立断，把比较文学确立为上外新组建的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主攻对象，并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内刊《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我留校工作以后，他即任命我负责筹办一本可以公开出版的比较文学杂志——《中国比较文学》。

筹办国内第一本专门的比较文学杂志,对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人来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压力很大。好在当时一批学界前辈都对此事非常关心,并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支持。季羨林先生欣然接受担任杂志主编,并在北京大学他的办公室里专门为组建杂志编委的事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在会上,他点名请李赋宁、杨周翰两位教授出任杂志的编委,两位教授也欣然从命。接着,我又去拜见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冯志、叶水夫教授,文学研究所的唐弢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佐良教授,同样得到非常热情的支持,并决定由叶水夫、杨绛、唐弢、王佐良、周珏良教授出任《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编委。在南京,我分别拜访了范存忠先生和赵瑞蕻教授。赵先生也表示很高兴担任即将创刊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编委,还送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诗集。在上海,筹办杂志的事进行得也是非常顺利:施蛰存先生和方重先生应邀出任副主编,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先生和林秀清先生应邀出任编委。廖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倪蕊琴教授不仅出任编委,还直接参与并指导杂志具体的编辑工作。

同时应邀出任《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首届编委的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圣经文学专家朱维之教授。朱先生于1983年6月,联合天津师大、天津外国语学院,以及天津外国文学学会等多家单位,举办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术队伍的组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我个人而言,这次会议也同样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孙景尧、卢康华、刘象愚、曹顺庆、杨恒达、刘介民、张隆溪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在编辑《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时就一直得到他们全力的支持。

1984年11月,时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饶芃子教授主办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会议。这次会议是对刚刚崛起的中国比较文学的一次有力的促进和推动,同时也是我个人早期比较文学生涯中浓重的一笔:与中国比较文学界“南饶北乐”两位“老太太”结下了终身的“忘年之交”,从而对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太太”之说是目前我们几个熟人小圈子内对饶芃子、乐黛云两位教授的戏称,其实那时,她俩还都是非常年轻的)。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我对饶芃子教授并不怎么了解。她主要从事文

艺学研究,而我对文艺学所知不多。在暨大开会期间的一个晚上,她专门邀请乐黛云、林秀清教授和我上她家喝咖啡,并征求我们对在暨大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的看法。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晚上的交谈,但饶先生富有文学情趣的谈吐、对学科建设清晰的发展思路(她那时已经提出了发展比较文艺学的设想),以及她在不经意间所流露出来的高雅脱俗的生活品位,令我非常欣赏,也非常敬佩。

与此同时,我在这次会上也拜识了心仪已久的乐黛云教授。在此之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研读过她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对她已经留有深刻的印象。而这次在会上亲耳聆听乐先生的发言,那印象就不止是深刻了。乐先生的发言所展示出来的开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学术信息、深刻的学术观点,再加上她极富感染力的话语和笑容,立刻征服了所有在场听众的心。然而,走下讲台的乐先生却又是那么随和、亲切,富有亲和力,很容易就把周围人凝聚在了一起。当时乐先生还兼任着深圳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所以在暨大会议结束后,她热情邀请我和林秀清教授,还有李希凡先生,一起到深圳大学去小住几天,顺便参观参观深圳这座新兴城市。这是我和乐先生近距离接触、直接交往的开始。自那时起至今,时间差不多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与乐先生交往、谈话的次数可谓不计其数,谈过些什么话也已经记不具体,但有一点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乐先生与我的每一次谈话,都离不开比较文学:或是谈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或是谈比较文学学会的活动,或是谈如何与国际比较文学对话,等等。

当然,对我的比较文学研究生涯有更直接、更深远影响的是贾植芳先生。我在接受宋炳辉教授对我所作的一次学术访谈中曾经谈道:“因为创办杂志的缘故,结识了贾植芳先生。这对我的学术生涯,是个关键的转折。1985年,我陪贾先生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从此与贾先生结下不解之缘。通过贾先生,我又认识了章培恒先生、吴中杰先生,以及陈思和教授等。贾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视野,使我受到深深的感染,也调动了我潜在的积极性。贾先生一直倡导现代知识分子不仅要读书、教书,而且要写书、译书和编书。这对我都有很大的触动,激发了我身上一些内在的东西。我对翻译有兴趣,‘文革’后也翻译发表了一些短篇译作,之后又培养起自己的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刚刚兴起之时,我

就注意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很自然,我就把翻译研究列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于是我就开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思考翻译问题。”

1989年,我发表了《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的译介学研究的开始。之后我又连着发表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等好几篇论文,都是这一研究方向的继续。只是文章发表以后,在赢得赞许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质疑之声。于是我决定写一部专著,以便能更加全面、深入地阐述我的译介学观点。这也是我撰写《译介学》的缘起。

1991年对我的译介学研究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年的10月,我得到加拿大政府的资助,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比较文学系访问半年。本来,我赴加拿大访问的任务是比较简单的,仅仅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然后在回国后写一篇关于加拿大比较文学的考察报告(文章)就可以了。但是我在收集、研读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论著的同时,却经常被阿尔贝塔大学图书馆内丰富的译学藏书所吸引。于是就在加拿大的半年访学期间,我读到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人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研究》论文集,读到了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文学理论与翻译文学》,读到了当时刚刚发表的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也读到了图里(Gideon Toury)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苏珊·巴斯奈特的专著《翻译研究》等。这些学者的著作,大大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我开始意识到,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正在形成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既是翻译研究家,同时又是比较文学家。但是对这些人,也就是西方译学界的所谓的“操纵”学派、“翻译研究”学派,或者又称文化学派,国内的比较文学界,也包括翻译界,却知之甚少。而更令我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是,我在这些学者的论著中明显感觉到他们的观点与我此前一直在思考、在探索的一些观点颇多契合之处。这让我想起了我赴加拿大之前曾出席过的一次国际跨文化研讨会,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讨论“误译”的论文,起先我还担心与会代表不一定能理解和接受我的观点。不料,一位日本学者在听完了我的发言后,当即站起来对我说,“你并不孤立,我本人也在研究误译,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在研究误译”。在加拿大半年的访学使我开始确信,我此前孜孜求索的译介学研究是正确的,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所以,从加拿大回来后不久,我就推出了我的第一部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接着,又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译介学》。

在《译介学》一书里,我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理论探索:一是接过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比的“创造性叛逆”的说法,把它作为译介学的专门命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阐释和发挥,从而使“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成了译介学的理论基石;二是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国别归属进行了深入探讨,明确了翻译文学是一个既不等于源语文学(外国文学)、又不等于译入语文学(本国文学)的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指出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厘清了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区别,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这两个概念分别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译介学》出版以后,引起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反响:第一版很快售完,出版社连续四次重新印刷,印数达到了两万,这对于一本学术专著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而且每年还都有较高的被引用率。这就大大激励了我的译介学研究:2003年,我推出了专著《翻译研究新视野》,2004年推出由我和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7年推出《译介学导论》以及和查明建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与此同时,从2001年起,我每年都会编选一本“翻译文学卷”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年文选丛书的一部分。我很重视这本“翻译文学卷”的编选工作,因为我觉得它以这种形式体现了国内文学界对我关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观点的认同。同样,我也很重视上述两本“文学史”编写,因为它们体现了我关于如何编写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的理念。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译介学研究同时还引起了国内翻译界的注意。自2000年起,我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参加国内,包括台港翻译界的学术研讨会,我的发言连同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论译学观念现代化》等,也不断在国内翻译界激起热烈的反响。我把这归功于我的比较文学学科背景,因为正是比较文学这一高屋建瓴的学科立场赋予我比国内一些传统翻译研究者更为开阔、更为独特的研究视野和视角,从而能发现和提出他们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诸如翻译的纯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最新走向问题、翻译学的学科意识问题,等等。在我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上外高级翻译学院还建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翻译学硕、博士学位点。

进入 21 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教材把译介学作为专章列入教材的内容,同时也随着国外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论著被越来越多地译介入国内,国内学界的译介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译介学不仅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界,而且也已经成为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研究界的一个众所瞩目的新兴研究领域。2006 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列为当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八大课题之一,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计划更是又一次把译介学列为国家“十一五”期间的外国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些举措表明译介学正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由此可见,译介学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仅仅属于比较文学,同时也属于外国文学,属于翻译学,甚至属于所有与跨语言、跨文化有关的学科。

从 1980 年发表《比较文学漫谈》那篇短文算起,我在比较文学学术道路上已经走了将近 30 年了。回顾这 30 年的历程,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较文学理论帮助我发现了译介学研究这样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我以我的译介学研究又在中国的比较文学领域里为自己,也为对此研究感兴趣的同行开拓出了一块既充满乐趣、又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术天地。

目 录

代序:我与比较文学	1
-----------	---

上 编

中国比较文学:危机与转机	2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	10
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	20
启迪与冲击	
——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	26
重申文学性	
——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思考	36
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	
——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及相关讨论	49
研究生教学:期待比较文学系列教材	59
强强联手,规范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	65
正视矛盾,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	73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78
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几点思考	87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98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	111

下 编

为“弃儿”寻找归宿	
——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122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	129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140
误译: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	152
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	161
建立中国译学研究的文艺学派	174
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185
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	194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209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221
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	229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244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	257
论译学观念现代化	269
并非空白的十年	
——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279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	293
后记	304

上 编

- 中国比较文学：危机与转机
-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 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
- 启迪与冲击
- 重申文学性
- 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
- 研究生教学：期待比较文学系列教材
- 强强联手，规范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
- 正视矛盾，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
-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 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几点思考
-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

中国比较文学：危机与转机

我们中国人的心态一般都忌谈危机，怕提危机，因为“危机”往往使人联想到“大事不妙”。其实，从学术角度而言，如果某一个学科出现了危机意识，这未必意味着该学科即将完蛋，相反，它也可能意味着该学科即将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拟从这个意义上探讨一下中国比较文学的突破口和它的前进方向。

一种可戏称为“三部曲”的倾向

自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以来，至今已有将近八九年的历史了。回顾这八九年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的：(1)影响研究，包括中外文学关系研究；(2)平行研究；(3)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研究；(4)科际研究。

影响研究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进行得最多、最为扎实，成就也最大。譬如季羡林先生的长篇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①就是以对《罗摩衍那》基本故事的剖析为出发点，首先揭示了《罗摩衍那》留在古代汉译佛经中的痕迹，接着以大量确凿的材料（涉及的范围广达 8 种语言）论证了罗摩故事在汉、傣、藏、蒙、新疆等民族地区的传布和影响，堪称我国影响研究的典范之作。赵毅衡先生前不久出版的专著《远游的诗神》，以丰富翔实材料，论证了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强烈影响。此外，像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贾植芳先生主编的《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等，都表明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正在卓有成效地向纵深方向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影响研究就不存在问题，关于这点本文后面将谈到。这里首先想谈的是平行研究中存在

① 载《中国比较文学》总第 3 期。

的一个问题。回顾近几年来我国平行研究的一些论文,我觉得或隐或显我们都能感觉到某种可戏称为“三部曲”的写作倾向。具体地说,就是当我们比较研究两部作品、两个作家或两个文学现象时,我们往往总是先提出它们“惊人的相似”;然后又指出,尽管如此相似,但还是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最后便是寻找产生这种“惊人的相似”的原因,或者说是总结规律,结论无非是“社会背景”不同、“民族特性”有别,等等。

笔者并不认为这种“三部曲”的倾向是错误的。寻找世界文学中的相似现象,发现文学发展的规律,可以说是萌生比较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这种研究完全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们的研究老是局限于这样的“三部曲”中,我们的研究如何能继续深入?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总要讲上几句类似‘通过比较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话。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找出了规律性的东西,问题就结束了吗?目的就达到了吗?我认为还没有达到。这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必须有点用处,为规律而规律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季先生接着又说:“总之,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要怕人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必须考虑一下实用,考虑一下功利。”^①

这两段话值得深思,这里季先生实际上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目的性问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文学”,我觉得主要是指平行研究。因为影响研究的目的比较明确:揭示文学的国际关系,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作家对异族文学的借鉴和创新,等等。平行研究则不然,我们找到了相同现象、发现了相异之处,并不意味着目的已达到。

季先生关于“实用”和“功利”之说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我们应该跳出原先比较狭隘的“某某与某某”的比较,而从宏观的角度看待某些现象,这样我们就能发现许多有趣而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譬如,对中外文学中的艺术形象类型的整理就大有搞头——假如我们能把世界各国文学中的吝啬鬼形象、流浪汉形象、妓女形象……都收集起来,分门别类,揭示其各自的特点和魅力,我们便可得到一部独具一格的《世界文学艺术形象辞典》。再譬如,假如我们能对世界文学中的主题、母题进行归纳、整理的话,我们便可得到一部很有意思的《世界文学主题史》或《世界文学母题概要》之类的著作。

①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第11期,第6—7页。

法国学者写过一部《三十六种戏剧情境》，总结出了西方戏剧中的全部情景。但他的研究没有涉及中国戏剧，我们能否在此基础上搞出一部《中外戏剧基本情境》呢？这些工作显然都是很“实用”，而且也有“功利”的。

其次，我们的平行研究是否还应该从前一阶段的较多地寻求“相似”、“类同”而开始关注、重视一个“差异”和“不同”？固然，“相似”、“类同”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差异”和“不同”，又未尝不反映了文学的本质？尤其是当我们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时，情况更是如此。乐黛云先生指出：“综合，不仅表现为类同和汇通的研究，也表现为对于殊异和差别的追索。”^①由于中西文学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民族趣味、地理环境都大相径庭，如果我们无视两者实质上的差异，一味追求表面的类同现象，就很可能会上走上瞎比附的歧途。正如贾植芳先生所指出的：“不了解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体系、不同特点，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就是连比较文学研究也容易流于形式上的比附”^②。

事实上，即使在当代的西方比较文学界，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通过比较文学揭示和认识各艺术品的内在价值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勃洛克甚至称这一觉醒“标志着比较文学新的最重要的动向”^③。因此，平行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否应该是，通过与异国或异族文学的对照来揭示民族文学的特征，阐明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在这方面，朱光潜先生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④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朱先生所指出的中西诗歌在情趣上的差异，诸如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而中国诗里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自然诗委婉、微妙、简隽，表现出一种柔性美，西方的自然诗直率、深刻、铺陈，表现出一种刚性美，等等，使我们对中西诗歌的认识更加具体而深刻了。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名与实》，见《比较文学丛书》总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贾植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③ 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④ 载《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